古 代 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

—— 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221年），又称东周，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它的前面是西周，后面是秦朝，都是大一统的局面。而在这中间的500多年里，东周王权日益衰落，众诸侯之间，大国争当霸主，小国力图保存自己。分裂的局面，伴随着激烈的兼并争斗。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个领域的变革，汇合成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其中百家争鸣体现的思想大解放，突出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无穷的智慧和变革精神。

聚徒讲学周游列国

一、从“学在官府”到聚徒讲学

我国古代的教育，到西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京城到乡野，有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内容也多种多样，有礼、乐、射、御、书、数，叫做“六艺”。这些学校都是官办的，所以说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在官府”。那时似乎还没有私人办学的事，也没有知名的教育家。

随着东周王权的衰落，学术文化也在下移，民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形成了自收门生、聚徒讲学的新风气，以至原先的官学竟变得无声无息。这是古代教育的一次大变革。这一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生机勃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聚徒讲学的老师，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学过西周的文化遗产,如《易》、《诗》、《书》、《礼》、《乐》和各国的史书，就是所谓“百国春秋”。由于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师承关系以及个人旨趣等等的差异，他们的学说各有特点，各自有所侧重，就像《周易》中说的那样：“一致而百虑”。

这些老师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教育家。他们富有理想，从民间广收门徒，不论门第出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按照自己的标准，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据史书记载。孔子（前551一前479）有弟子三千；孟子（前390一前305）出游，随从的学生有几百人；墨子（约前468一前576）的学生禽滑厘曾经带领300人守卫宋城；孟胜曾经带领门徒183人为楚国阳城君殉身；田骈（pián）在齐国有门徒百人；宣传神农学说的许行到滕国，也带了门徒几十人。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表明那时聚徒讲学的规模。

这种讲学，归根到底也是为统治者服务，不过和官学相比，它们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摆脱一些束缚，自由教学。老师是一流的，很有权威，学生像敬爱父亲一样地敬爱老师。同时，由于来去自由，师生关系没有依附性，完全是基于教学的结合，在学问上师生相互质疑，平等讨论，教学相长。老师们把培养人才看成人生一大乐事，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些新的

精神风貌，在师徒之间代代相传，各种学术日益发展，形成了许多学派，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二、招揽贤士和周游列国

各国争霸图存，亟需人才，而旧有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得士者兴，失士者亡。”“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氏春秋·赞能》）统治者们迫于形势，都在千方百计地招揽贤士。燕昭王（？—前279）给郭隗（kuí）建造黄金台，表示自己礼待贤人。齐王在都城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厚待学者，最盛时达1000多人，著名的如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宋钘、慎到、邹奭（shì），还有荀子（约前313—前238），都曾经在这里游学。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前251）、魏国的信陵君（？—前243）、楚国的春申君（？—前238），他们号称“四公子”，都养了大量的士，连“鸡鸣狗盗”之徒，也在收养之列。秦国的吕不韦，养士三千，门客们为他编成一部传世的名著，叫做《吕氏春秋》。

统治者招揽贤士，培养各种人才的老师便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向国君宣传自己的学说，希望受到重用。当时，各国一般不加限制，游说之士可以到处跑，而且会受到礼貌的接待。不过，学派众多，竞争十分激烈，阴谋暗算也不少见。在竞争中成长的各学派，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断充实力量。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旨和学风，领袖们又都有令人敬仰的人格。例如，墨家学习大禹治水精神，不知疲倦地宣传和推行墨子的学说，烟囱不黑，坐席不暖。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坚信自己的学说是“利民萌、便众庶之道”，

明知有艰险，也决不放弃这“仁智之行”。（《韩非子·问田》）当时，是战争和变法的时代，讲法术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前310）那样的纵横家，容易受到争霸国君的重用。儒家讲仁义，墨家讲兼爱，虽然都是影响很大的显学，却很少有机会当政。孔子带着学生跑过齐、宋、卫、陈等好几个国家，到处碰壁，受过许多逐斥困阨之苦，但是始终没有灰心。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学说，主张实行仁政，被人看做“迂远而阔于事情”的迂夫子。然而他也不灰心，还是到处讲学辩论，晚年著书立说，写成《孟子》七篇。

孟子有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当时的士，对于国君、卿大夫来说，都是贫贱者，但他们以贫贱骄人，重道重志，贫贱、富贵、威武都不能使他们改变信念。学派领袖们游说诸侯，合则留，不合则去，决不奴颜卑膝。一次，墨子让弟子公尚过前往越国游说，越王十分高兴，对公尚过说：“先生如果能使墨子到越国来给我指教，我可以把原来吴国的土地方500里封给他。”于是公尚过带回50辆车子来迎接墨子。墨子问他：“你看越王能听我的话，实行我的理论么？”公尚过说：“恐怕不可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就是您也并不了解我啊！如果越王能够听我的话，实行我的理论，那么我就会去，和一般臣下一样吃饭穿衣，哪里需要封地啊！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实行我的理论，我去了，便是拿道义去出卖了。同样是卖，在中原也可以，何必在越国呢？”（见《墨子闲诂后语·墨子传略》）墨子追求的是学派理论的实行，他反对把学术作为谋取利禄的资本，出卖道义来换取优厚的生活享受。这种精神，也是其他一些学派领袖所共有的。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学术上的

百家争鸣。

学者们聚徒讲学，各国统治者招揽贤士，在大变革的时代里，士阶层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思想解放百家争鸣

一、新时代的思潮

春秋战国时期争鸣的百家，主要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以及杂家和小说家。“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各家随着学说的发展，又分为各派。他们探索哲理，体验人生，研讨政治得失，寻求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天上人间，一切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考虑之内。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其中相同的部分，构成这个时代薪思潮的主流；不同以至对立的部分，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自由和深化。这便是新思潮可贵的特点。

从猿到人，起初我们祖先作为大自然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万物之灵”。在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和神的意志。人间的帝王，自命为“天子”，受“天命”统治天下。做事要求神问鬼，把沦为奴隶的人当作牲畜，人格不受尊重，甚至任意屠杀他们。直到西周，“敬天保民”的思想才发展成为一种道德。随着社会的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终于敲响了时代的钟声。在他们心目中，天就是自然，所谓皇天上帝，只是人的创造；在社会上，君和民相比，应该是民贵君轻；这世界上，人最可宝贵，人们应该相爱，而不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相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思想变革。

道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35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2章》）这里所说的“天”，服从“自然”，显然不是有意志的上帝。孔子不讲“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而且“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他有时也感慨地讲“天丧予”“命也”一类的话，但并不强调天上有神。他还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墨子》书中，有《天志》三篇，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要求帝王体天之意，同时还要求天下的士君子也顺天之意。粗看好像墨子相信皇天上帝，然而仔细读来，并非如此。《天志下》里说得明白：“顺天之意若何？曰：兼爱天下之人。”我们知道，“兼爱”正是墨子自己的主张，这个“天”其实就是墨子自己。

对于“天”的认识，最接近科学的要数战国时期的荀子。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社会的治乱不由天时决定，自然灾异令人奇怪但不必害怕。日蚀月蚀发生时，大家敲锣打鼓营救；天旱时，大家忙着祭神求雨；遇到大事，便求神问卜来坚定可否。这些老传统人们做惯了，做做仪式也无妨，如果真的相信有神，那就凶多吉少了。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在天人关系上，荀子认为主导者应该是人，应该由人“制天命”，而不是传统所说的人为“天命”所制。这真是一种思想革命。（见《荀子·天论》）

在君民关系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 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位置，人民在前，君主在后。墨子鼓吹兼爱，他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荀子说：“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君道》) 法家主张法治，严邢峻法，说到底，主观上也是为了利民。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也是出于爱民。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75章》) 从上述代表性言论我们可以感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爱民思想，已经在西周“保民”思想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其中孔子提倡的“仁”和后来孟子继此鼓吹的“仁政”，影响特别大。

“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孔孟都反对不义的战争，梁襄王问孟子谁能统一天下，回答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 墨子反对大国攻小国，到处呼唤和平，不遗余力。他说：“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贱也，过必反于国。”(《墨子传略》) 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里没有战争“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80章》)。孙子是研究打仗的兵家，但也不嗜杀人，向往和平。他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 不战而胜，这里既有新时代兵家的智慧和谋略，也包含着一个“仁”字，即所谓“仁义之师”。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 墨子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上》) 荀子主张：“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

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在这里，早时宗法制度规定的贵贱尊卑，已从不可逾越，变为可以转化。后来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意义上说，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各家的共同思想，反映了新时代人民觉醒的主潮。

二、一致百虑，殊途同归

诸子百家之间，又有许多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自由。

对社会来说，他们都是有志救世的医生，只是所开药方不一样，例如：孔孟是仁政，墨子是兼爱，荀子是礼治，老庄是无为，韩非是法、术、势。

对子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荀子说：“人之性恶，有善者伪（人为的）也。”(《性恶》）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上》）看法相互矛盾，但各有各的道理。

对于人生，各家的观念也有许多差异，大致可分为积极进取和消极避世两类。儒家强调自强不息。孔子奋斗一生，不知老之将至，所怕的是君子“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墨子劳身苦志，一心救世，摩顶放踵，以苦为乐，最具献身精神。杨朱呢？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这一派认为，古人损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不会去干，也不赞成拿天下的一切来奉养一人；人人不损一毛，人人不利

天下，天下就太平了。他们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保全原有的天性，满足合理的欲求。他们认为“六欲皆得其宜”的人是“全生”，部分满足的是“亏生”，六欲都不得其宜的是“迫生”；“迫生”还不如死去，死倒可以回复到当初无知无虑的状态。（见《吕氏春秋·贵生》）老子是位避世的隐君子，他批评孔子不识时务，希望他去掉骄气和多欲。（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前369—前286）做过蒙国的漆园吏，后来楚威王要聘他为相，他对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您没有见过郊祭时用作牺牲的牛么？它被养了几年，吃得很好，又穿着丝绸，送进太庙。到这时候，想做只猪也不可能了。您快走吧，别玷污了我。我宁可在污水沟里游戏自乐，也不愿受国君的束缚。”（同上）

“道不同不相为谋”，各派对异己的攻击相当猛烈。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庄子“诋訾（dǐ zǐ）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墨）以武犯禁”，都是国家的蠹虫。（《韩非子·五蠹》）荀子则说庄子一派“猾稽乱俗”（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墨子的主张不少是和儒家相近的，但也说过“儒者礼烦扰而不悦（tuō，简易），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守孝）伤生而害事”（《墨子传略》）一类的话。这些攻击，从对方说来，不一定都符合事实，但攻击者从相反的方向确实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这在整体上无疑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

各派之间，互相诘难，也互相吸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庄子和惠施（？—前310），一个是道家，一个是名

家，两人常有辩论。惠施逝世，庄子叹息说：“自从夫子去世，我没有讨论的地方了！我没有可以讲话的人了！”（《庄子·徐无鬼》）而且，从人来看，荀子还属儒家，他的弟子韩非、李斯（？一前208）却是著名的法家；从思想看，法家韩非的思想有些又来自道家。在战国时期，综合各家的趋势也已经出现。黄老之学的兴起，荀子研究儒、墨、道德各派学说的优劣，以及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都是明证。这一趋势，反映百家争鸣中“殊途同归”的特点。

成果辉煌　影响深远

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富有变革精神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五百多年间，各派学者著书立说，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政治、伦理、经济、法律、军事，以至文艺、科技、医药等一切方面，在水平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百家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其中《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邹子》、《韩非子》、《管子》、《孙子》、《公孙龙子》、《惠子》、《苏子》、《张子》、《神农》和《吕氏春秋》,是主要学派的代表作,其他还有《晏子》、《子思》、《李子》、《鲁仲连子》、《虞氏春秋》、《列子》、《慎子》、《申子》、《野老》，以及研究六艺的专著等等。这些著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集中反映了大变革时代焕发的伟大民族的智慧。

世有治乱，人有穷通。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说：“人心不同，有如面焉。”世道人心，都是复杂的。然而，后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能从诸子的著作中受到启发，

找到办法。历史向前进，学术文化在发展，然而后来的一切学术思想，似乎都能从诸子百家中寻到源头。因此，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是诸子百家。这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基于实际生活，通过独立思考所创立的各种学说，各自有它适用的范围和存在的价值，禁不了，烧不完。战国时期和秦代，统治者多用法术之士。西汉初，休养生息，重用道家，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前156—前87），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列为唯一的官学。其他学派不能和儒学比肩，但是他们的书还是有人读，有学问的人都能博通百家。而且，这时的儒学已融进了许多别家的内容，大儒董仲舒（前180—前115）就精通阴阳家的学说。此后，儒家以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和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同时，也有不少统治者曾经综合儒法，以至道家学说而用之。至于个人思想，那真是形态万千。令人惊奇的是，从皇帝到农民，无论是学者还是文盲，他们的种种精神，就类型说，几乎没有一个能超出诸子百家所论述的范围。那怕是现代人，情形可能也差不多。炎黄子孙血管里流着祖先的血液，大脑里也多少不等地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构成中华民族灵魂的种种传统美德，无一不和这次百家争鸣的伟大创造有关，尽管它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思想没有国界。诸子百家的著作早就传到国外，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当代，这影响还在增大。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说：“这些哲学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部分。”（《世界文明史·中国与远东》）

从汉、唐时期开始，亚洲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国，便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习以儒家为主的诸子学说，并逐步形成今日所谓的“儒教文化圈”。13世纪末，马可·波罗的随员把一批儒家经典，作为异国珍宝带回意大利。16世纪起，西方的传教士陆续来中国传教。他们宣传基督教义，同时也发现了儒学。利玛窦1595年在南昌刊刻《天学实义》，用儒学论证教义，说天主就是儒家所说的上帝。他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史》中说：儒家思想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比利时的柏应理、奥地利的恩理格，他俩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敕令，合编《西文四书直解》。此书封面的孔子像上，标有“国学仲尼，天下先师”八个大字。

孔子学说的传入，给西方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神力量。欧洲从“神学时代”走向“哲学时代”的大变革中，从儒学吸取了许多精华。法国的伏尔泰说：“我发现《四书》、《五经》是一种最纯洁的道德，丝毫没有虚伪的内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英国的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绪论》中，说孔子“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美国的艾默生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张其昀《美国文化与中美关系》）法国大革命中，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赫然写着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历史进入20世纪，儒学在世界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明显。美、英合编的《新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说：“在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里，很难找出能和孔子相提并论的历史人物。”80年代，美国《人民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位居第

一，其次是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大利的阿奎那，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达尔文，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

在亚洲，“儒教文化圈”中的各国，更以极大的热情，把儒学和现代化结合起来。日本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文化”。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杰出的企业家，和香港、台湾的同行一样，他们管理企业的名言是：“《论语》加算盘。”

面对新的挑战，西方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学习儒家思想的必要。1945年冬天，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维系世界和平，不但未能获得和平，反而造出第二次大战。今后的唯一办法，应是发扬人类道德，灌输仁人的道德精神，“然而道德必以中国孔子的道德为目标”。（见《孔子大同概论》）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和平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还有待解决。怎么办？19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去巴黎开会，会后在宣言里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写过专著《日本第一》，并由此激起“学习日本”热潮的美国教授伏格尔，鉴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中蕴藏着丰富的管理思想，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儒学以外的诸子书，如《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管子》等，也是外国各界人士吸取智慧的源泉。1988年，《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哈泼出版公司以13万美元的高价，买下史岱分·米契尔的老子《道德经》英文新译本，因为他有“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对这本书的浓厚感情”。而美国总统里根，在1987

年6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就引用了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名言。在19世纪的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把《老子》和基督教的《福音书》相提并论，为了寻求解脱生死苦恼的途径，他全神贯注地阅读《老子》。老子思想影响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又影响了当时的世界，例如他的“不抵抗主义”。

让我们再看看《孙子兵法》。16世纪日本武将武田信玄的军旗上，有16个大字：“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这些字句，就摘自《孙子兵法》。法国拿破仑也经常带着这部兵法去打仗。当代的战略家们，又用孙子思想来解决核时代的战争问题。60年代初，英国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后来，美国的福斯特和日本的三好修，他俩运用《孙子兵法》，提出对苏新战略，并被美国总统卡特采纳。这个战略就叫“孙子的核战略”，它用“相互确保生存和安全”，取代“相互确保摧毁”。这精神来自《孙子·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已有日、法、英、德、俄、捷等各种译本，流传世界各地。它不仅是军人的必读书，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企业家、商人，以及各行各业都有人承认了它的价值，称它是“政治秘诀”、“外交教科书”、“人生哲学”、“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有人甚至说它是万能的。其实，内容的多样性和适用的多面性，正是诸子著作的共同特色。

百家争鸣，这由思想变革形成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用它无与伦比的辉煌成果和深远影响，昭示人们，

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社会的进步，又有赖于学术文化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有这百家争鸣，被后人称为“黄金时代”。后来，那样的盛况不常有，但这在大变革中诞生的争鸣精神，却万古常青，激励人们奋进。

奴隶制的丧钟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为什么发生在战国时期呢？因为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王室衰微　奴隶制摇摇欲坠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繁荣以及衰落的时期。奴隶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基本上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西周初期，宗法分封制进一步发展完善。如果说分封制是用政治分权的办法来加强天子的统治地位的话，那么宗法制便是利用血缘关系来维系王室奴隶主大贵族的垄断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具体地说，就是用“大宗”和“小宗”的等级区别，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统治网络，形成以天子为大宗，确立其天下诸侯共主的地位。规定王位由嫡长子（即国王正妻所生的长子）继承，世世代代保持大宗的地位不变，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庶子则分封为诸侯。如西周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处于小宗的地位，但在诸侯国内又是大宗，诸侯国君同样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兄弟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从诸侯那里得到采邑（封地）。卿大夫对诸侯国的国君来说是处于小宗

的地位，但在受封的采邑内又是大宗，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其他兄弟受封为士，士从大夫那里分得禄地。西周奴隶主贵族就是通过这样的宗法分封制，建立起周天子—— 诸侯 —— 大夫—— 士的政治体系与权力阶梯。诸侯要承担保卫王室，向周王朝贡、庆贺，承担重大工程的建设等义务。周王对诸侯握有赏罚予夺之权，所以在西周时期，周王处于天下诸侯共主的地位是非常巩固的，统治秩序也是基本稳定的。

到了西周末年，昏庸残暴的周幽王，宠爱美丽的妃子褒姒，要把申后和太子宜臼废了，另立褒姒为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因而引起申侯（宜臼的外公）的强烈不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申侯与犬戎族的联合进攻中被杀，宣告西周灭亡。由于镐京遭到严重破坏，第二年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邑（今洛阳），历史上称为东周，也叫春秋战国。这个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重大变化，奴隶制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统治秩序无法维持，奴隶制处于崩溃之中。

此时，王室衰落，周王的地位下降。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虽然周王名义上仍保持天下共主的地位，实际上已不能继续号令诸侯，甚至还要受到诸侯的欺侮。例如周平王在位期间，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操纵王室大权，周平王只好忍气吞声，妥协退让。周平王死后，周桓王想立虢公执政，以削减郑庄公的权力，结果遭到郑庄公的反对，还派兵割了东周温地的麦子，秋季又夺了成周（洛阳）的庄稼。为此周桓王十分气愤，组织陈、蔡、卫三国军队讨伐郑庄公，结果桓王中箭负了伤，差点儿一命呜呼。周桓王死后，王室穷得没有钱办丧事，过了七年才举行葬礼，由此可见周王的地位已不及诸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